

比较视野中的孔乙己形象解读

— 以“多余人”奥涅金为参照 —

何 嵩 昱*

— <目次> —

- | | |
|-------------------------|-------------------------|
| I. 引言 | IV. 奥涅金与孔乙己之性格比较分析 |
| II. 对奥涅金与孔乙己形象的理性理解 | V. 奥涅金与孔乙己形象出现的特定社会现实意义 |
| III. 奥涅金与孔乙己形象产生的特定历史背景 | VI. 结语 |

I. 引言

“多余人”形象的产生在中俄文学中并非同一时期，从源流来说，它缘起于19世纪20至50年代的俄罗斯文学，“多余人”这一词汇最初见于屠格涅夫的中篇小说《多余人日记》。但这一形象的基本特征却是在普希金的诗体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中才得以确定下来，并进而诞生出了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系列。因而，“奥涅金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多余人’的鼻祖”。¹⁾“多余人”作为一个文学概念，则是赫尔岑在19世纪50年代分析奥涅金这一形象的特征时提出来的，他指出：“奥涅金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人，因为他从来不做什么事，他在他所处的范围是一个多余的人，并且没有足够的性格力量可以摆脱出这个范围。”²⁾从赫尔岑的分析我们可以知

* 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现任岭南大学中国言语文化学部副教授。

1) 郑克鲁主编《外国文学史》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272页。

道，之所以说奥涅金是一个“多余人”，就是因为他的“游手好闲”、“从来不做什么事”，虽然对自己生活的上流社会感到厌倦但又由于自身的性格弱点而没法摆脱那样的环境，缺乏向社会挑战的勇气。于是，他只能处于迷茫当中，整天无所事事，在那样的社会中多余的存在着，可以说他是俄罗斯当时社会制度下的特定产物，用赫尔岑在他的《论革命思想在俄罗斯的发展》中的话说就是：“奥涅金，这是俄罗斯人，他只能在俄国出现。……奥涅金，这是一个浪子，他是他所处社会中的一个畸零人”，这里的“畸零人”即是“多余人”；俄国19世纪作家杜勃罗留波夫也曾经指出，“多余人”是“我们土生的民族的典型，所以我们那些严肃的艺术家，没有一个是能避开这种典型的”。

其实，“多余人”形象并不是俄国文学史上独有的文学现象。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也出现了一系列可以称为“多余人”的人物形象，只是在中国文学中，“多余人”更多的是被称为“孤独者”或是“零余者”。但这与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完全是等同的，因为他们都有着“多余人”共有的性格特征。在中国文学中，最早将“多余人”一词从俄罗斯引入的是瞿秋白，他的《赤都心史》中就有“中国之‘多余人’”一节，而且他还专门引述了俄罗斯文学中的又一个“多余人”罗亭这一形象，但只是到了鲁迅的小说中，才真正的发展了中国的“多余人”。在鲁迅的小说中，以《孤独者》中的魏连受发端，包括子君、涓生、狂人、孔乙己、阿Q等等，这些形象无论是其质还是其量，都堪与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相媲美。鲁迅笔下的这些“多余人”，大都是郁郁寡欢，高度敏感，徒有理想而却又一事无成，虽饱读诗书却又迂腐至极的知识分子，同时他们对中国当时社会的黑暗和腐朽感到麻木，缺乏认识。而这其中，孔乙己是很有代表性的，这一形象所表现出来的特征与奥涅金也是十分相似的。同为知识分子，他们也有理想和追求，有头脑，但是社会的黑暗和环境的重压使得他们的种种想法都不能实现，因而只能作为“多余的人”而存在。沙皇统治时期的俄国是这样，军阀统治时期的中国也是这

2) 赫尔岑著《文学的战斗传统》，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版，13页。

样。但是,要对二者进行比较,首先就必须对孔乙己是否是“多余人”进行分析说明。

II. 对奥涅金与孔乙己形象的理性理解

如前面论述的,在世界文学史上,对奥涅金是“多余人”是早有定论的,在中国文学史上,对孔乙己是否是“多余人”却尚无定论,本文把孔乙己定义为“多余人”,是基于孔乙己有着“多余人”所共有的特征。在此,我就以奥涅金作为形象参照的本体,从三个方面来论述一下之所以把孔乙己定论为“多余人”的原因。

其一,从社会属性方面来看,孔乙己与奥涅金一样,都是处于新旧社会力量交替、社会思潮激烈纷争时代的知识分子形象。他既是在新的社会思潮下生活,又是在封建固有的传统思想下生活,因而,他与奥涅金一样,都是“生活在两个世界边缘”(高尔基语)的人物,同样表现出自己与现存社会的格格不入。于是,在现存的社会中,孔乙己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而被社会抛弃,同时他也抛弃了社会而成为“多余的人”。

其二,从个性特征方面来看,孔乙己与奥涅金一样都具有复杂的性格特征和精神世界,他们的这种复杂性既来自当时的社会,也来自他们自身,在他们的身上,总是存在着深刻的难解的矛盾。于是,孔乙己便象奥涅金一样,成为性格分裂的人,总是陷于理智与情感、灵与肉的强烈的内心自省与忏悔当中,因而在性格上表现出忧郁的特征。既然在性格上表现出忧郁的性格,那么在行动上他也必然要表现出忧郁的特征,也就是犹豫,甚至是麻木的特征。思想上忧郁了,行动上麻木了,孔乙己的存在自然也就是多余的了。

其三,从审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孔乙己与奥涅金形象一样,都有或浓或淡的悲剧色彩,而且,应该说孔乙己的悲剧性要显得更浓一些。孔乙己与奥涅金的悲剧性不仅表现于外在的有形的痛苦,同时又表现于灵魂深

处的无形的精神磨难之中(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孔乙己的外在的有形的痛苦和内在的无形的精神磨难要甚于奥涅金得多),因此,孔乙己形象与其他的“多余人”形象一样,是以悲剧的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以悲剧的美等待读者去阅读、鉴赏的。

通过以上对照可以看出,孔乙己拥有“多余人”所共有的特征,我们有理由把他称为“多余人”。

III. 奥涅金与孔乙己形象产生的特定历史背景

19世纪的俄国文学与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中都出现了“多余人”的形象系列,分别产生了奥涅金与孔乙己这样的不朽的“多余人”典型。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文学现象,既与中俄当时的文化传统有关,也与中俄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有关。

首先,从文化传统的角度来说,奥涅金与孔乙己都是特定历史时期下各自民族文化的产物。

19世纪的俄国传统文化是东西方文化不断交融的矛盾复杂体。但是,俄国自身的农奴制和封建专制文化势力十分强大,在这样的文化精神的冲突下,俄国贵族知识分子身上也会体现出这样的进步性与落后性的冲突。而奥涅金正是这种冲突的精神代表和体现者。他的文化意识的表层已经非常接近当时欧洲的先进文化,但其文化意识的深层依然无法克服本土文化中的农奴制、封建专制等思想,他无法突破这样的冲突,精神上表现出软弱、忧郁的特征而成为了世界性的“多余人”。正如赫尔岑所描绘的那样:“他们在本国是外国人,在别国也是外国人,他们是懒惰的旁观者。在俄国人看来,他们是让西方的偏见败坏了的;在西方人看来,他们又是让俄国的习惯败坏了的。他们是一种聪明的‘多余人’。”³⁾其实,只要读过《叶甫盖尼·奥涅金》的读者便会知道,这种文化冲突最集中的体现,就是在奥涅金

3) 赫尔岑著,巴金译《往事与随想》,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108页。

对待爱情问题的时候。按俄国欧亚派核心人物特鲁别茨科伊把文化建筑分为“上层”和“底层”的观点，“多余人”正是介于“上层”和“底层”之间的过度带，他们既不是完全的“上层”的，也不是完全的“底层”的，而是兼两者特点共有的中间阶层，是二者交流与相互作用的作用者。因此，“奥涅金这种‘多余人’正是两种文化相遇的产物”。⁴⁾

而20世纪初的中国，在文化上也可以说是处于中西文化的交流和吸收当中。当时，中国的有志之士们看到国家的贫穷落后，纷纷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这种学习至“五四”时可以说已经达到了高潮。但是，封建的传统文化和礼教制度在中国根深蒂固，而且，这种传统文化的势力在中国依然强大，处于文化的绝对统治地位。作为这种文化体系核心的封建礼教制度，便成了束缚人们思想的根源，尤其是知识分子，受到这种封建礼教的戕害是相当深的，孔乙己就是其牺牲品之一。孔乙己从小就受教于这样的封建文化，以致于他满脑子都是封建的文化思想，连“茴香豆”的“茴”字也要讲究几种写法。不难理解，正是在这样的封建传统文化氛围中，才孕生出了孔乙己这样迂腐的知识分子，也正是这样的封建传统文化，才是孔乙己得以生存的文化土壤。

其次，从社会背景的角度来说，无论是奥涅金还是孔乙己，他们都是在自己民族中的特定时期出现的，他们既是时代的，也是社会的，但同时他们的出现又不是偶然的。考察19世纪的俄国历史和20世纪的中国历史，我们便会发现，两国在产生“多余人”形象时的社会状况是十分相似的，即他们都是特定的社会背景下的产物。

19世纪初的俄国与20世纪初的中国一样，都处于内忧外患的痛苦转型期。1812年的俄国经历了反拿破仑入侵战争的胜利后，民族意识已经觉醒，广大民众已经对当时发展到了末期的农奴制度感到极度的不满，彼得大帝的改革正使俄国在万分的不情愿中慢慢的摆脱了曾在俄国生存已久的农奴制。但是，这种改革必然要损害到贵族的利益。“在这种情势下，贵族

4) 高尔基著，缪灵珠译《俄国文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357页。

青年中开始出现政治上的分化：一部分人渴望为祖国做一番事业，要求改变现存制度，这些人就是十二月党人；另一部分人仍然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企图永久保持贵族特权地位；而第三种人则是贵族青年中的一部分，他们感到时代的风暴即将来临，不甘心和贵族阶级一道灭亡，但阶级的局限又使他们没有勇气与能力去参加革命斗争，也看不见社会发展的前景，因此终日彷徨苦闷、焦急不安，即染上了人们所说的“时代的忧郁病”。⁵⁾而这第三部分人，就是以奥涅金等贵族青年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多余人”。奥涅金一方面在疏远，准确的说应该是在逃避自己生活的上流社会，逃避他所生活的宗法制家族关系，但同时他又感到自己在这样的环境中，无论在道德上还是在精神上都有一种优越意识，于是学会了“诡诈的说话”；而另一方面，他又感到自己“心智疲惫”，于是对社会表示出深刻的怀疑，以至在行动上出现言行脱节的状况。这两个方面的性格特征集中到他一个人身上，便产生和演变为了“多余人”。

虽然，奥涅金本是个思想清醒而敏锐的人，但由于自身性格的悲剧性，他表现得善于怀疑，而且是个犬儒派；他精于“诡诈的说话”，并在宗法制的家族关系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例如，他对自己临终的伯父的态度，从他说的第一句话里便昭然若揭了。但是，身处这样的宗法制关系中，他不得不屈服。也就是说，他的诡诈和虚伪都是这种宗法制关系的需要。当他在说谎和作假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无聊的抱怨自己几声”，这一性格在他与连斯基的决斗中表现得十分的明显。他虽然明白自己有过错，但他还是恶意的戏弄连斯基的“羞怯的温柔”的爱情；他迫于自己生活的宗法制社会的舆论，即贵族阶层的偏见(尽管他知道这样的偏见一文不值)，可他还是接受了决斗的挑战，并且极尽残忍的杀死了自己的好朋友连斯基。而他所有的这些“多余人”的性格，都是俄国当时虚伪的宗法制关系下的必然产物，也正是俄国当时内忧外患的社会状况和历史条件，才孕生出了奥涅金这样的极具典型的时代“多余人”。

5) 郑克鲁主编《外国文学史》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271页。

与19世纪初的俄国一样,20世纪初的中国也由于阶级矛盾的尖锐和封建专制统治的黑暗,国家内忧外患,民族意识麻木,人民生活艰辛,渴望改革。在20世纪初的中国,封建主义的传统力量依然牢牢的统治着中国的时代,而同时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又在蓬勃开展,并正向封建的统治思想和统治阶级发起冲击。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处于社会中下层的部分知识分子,一方面表现出对封建传统的叛逆性,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疏离,因为他们自身的软弱的性格还不足以与封建力量进行决裂,同时由于自身认识的狭隘性而又不愿走进无产阶级的队伍。也就是说,他们即不愿与他们所叛逆的封建传统合流,又不能与他们所疏离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结合,于是只能处于时代的夹缝当中,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各自在生活中应有的位置而多余的存在着。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一批有着新思想的作家便站在时代的浪尖上,用自己的笔去直击这种矛盾。于是,在文学作品中塑造这些“矛盾的、不思进取的”时代“多余人”就成了众多作家的共同选择,而在这些作家当中,尤以鲁迅的刻画最为深刻、典型。鲁迅作为当时最为激进的作家,他以敏锐的洞察力发现了在那些自诩为“新知识分子”的人身上存在的的不容忽视的缺陷,而孔乙己便是这样的自诩为“新知识分子”的代表。他软弱无能,思想迂腐麻木而又有些神经质。由于自身的软弱无能,孔乙己不能完全摆脱旧文化的束缚,所以他的内心总是表现出勇敢与懦弱的双重性格,这与奥涅金的性格是十分相似的。孔乙己是社会的边缘人,是旧制度的牺牲者,当时的社会状况和他生活的环境决定着必定要成为时代的“多余人”。

IV. 奥涅金与孔乙己之性格比较分析

作为中俄文学史上“多余人”的典型,奥涅金与孔乙己都集中体现着“多余人”所共有的特征。他们整天无所事事,游手好闲,只会空想,而却没有实际行动,是典型的“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总之,他们集合了

“多余人”所共有的特性。他们对自己来说是多余的，对社会来说也是多余的，他们的存在对自己来说已经没有意义，对社会来说也没有意义，活着对他们来说已经是一种痛苦。表面上，二者似乎没有太多差异性，但是，细究起来，他们在性格特征上还是有许多值得探讨的地方。

其一，从二者同为知识分子的角度来说，虽同为知识分子，但奥涅金是出身上流社会的贵族知识分子，他年轻富有，终日沉迷于酒香肉色当中；而孔乙己则是地道的农民出身的知识分子，他贫困潦倒，迂腐至极，终日只会喝酒和买弄“之乎者也”的“学问”。

奥涅金是出身上流社会的贵族青年，他本是个年轻富有的贵族知识分子。但是，由于他从小所受的教育都是洋式的畸形的教育，他进入成年的过程中，过的都是空虚无聊的上流社会日子。当他成年以后，并没有把这些学问用到为祖国的发展所做的贡献当中，而是用来编纂爱情的花言巧语，用来取悦上流社会的贵族妇女，“逗得她们哈哈大笑”。他总是无所事事，不思进取，他终日消遣玩乐，看节目、吃宴席、吃夜宵和玩弄女人，因为他找不到生活的节奏和动力，他集中体现了当时所有的游手好闲的贵族青年的特点。比如他在看戏时，一边对别人哈腰、卖乖，一边“却心不在焉的看着舞台，打着哈欠把口开：演员年纪太大，应该离开舞台。”作为知识分子，他没有把自己投身到当时俄国轰轰烈烈的民族改革当中，尽管他在农村也进行过改革，但这并不能说明他想真正的为人民做点什么，那只不过都是他一时的心血来潮而已，事实上，他也很快的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总之，无论是对别人还是对社会，他都显得那样的多余。

而相比较奥涅金而言，孔乙己虽也是知识分子，但他是一个生活潦倒而又近乎迂腐的知识分子形象。因此，孔乙己的“多余”就更显得具有悲剧性，因为他是一个深受封建科举制度毒害的知识分子形象。虽然孔乙己所受的教育也是畸形的，但是，确切的说，那是变态的封建的畸形教育。孔乙己虽然沦落到了穷愁潦倒的地步，但是他对于封建文化教育的毒害，却没有任何认识，仍然醉心于封建科举考试，仍然虔诚的坚信“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以及“书中自有黄金屋”等思想。

他把考不上秀才,看得比偷东西被揭发还要难受。他对封建教育制度的毒害连一点点认识、甚至连一点点觉悟都没有,已经到了麻木的极点,而这正是他的可悲之处。孔乙己本来十分穷苦,但又要故意展示自己的身份,他的表现和实际地位,便构成了一个既十分相称,又十分尖锐的矛盾。孔乙己生活在那种年代,人与人之间本来就缺乏了解和同情,孔乙己这种穷酸的性格,自然就成了群体所不容的取笑的最好的材料。

在封建社会里,知识分子是一个特殊的阶级,他们除了生存的需要之外,还有较高层次的精神需求。然而,作为知识分子,孔乙己的现实的生存环境与这种精神上的需求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他只有在“之乎者也”的迂腐中寻找精神的寄托。他本有着知识分子固有的善良,但是,他的这种善良是不可救药的,他毫无长进,虽知书达理而又自暴自弃。他和许多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一样,想利用孔孟经书,通过科举考试之路向上爬,但最终却“连一个秀才也没捞到”,成了考不上秀才的“老童生”。于是,作不了“君子”,“又不会营生”,只能通过偷窃来混两碗酒喝,多么的可悲!他虽饱读诗书,但又没有多大的学问,却又要满口“之乎者也”,还一个劲的教小伙计茴香豆的“茴”字的几种写法,多么的迂腐!至此,我们不能不为孔乙己感到悲哀,不得不为作为知识分子的孔乙己的悲剧性感到心灵的震撼,也真正体会了鲁迅的“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⁶⁾的悲剧哲学。孔乙己的“多余人”悲剧是由封建教育制度造成的,而他对自己的这种多余及其造成自己多余的原因却茫然不知。封建的科举制度已经毒化了孔乙己每一个细胞,可悲的是,他至死也没有对这样的封建教育表现出任何的觉悟,孔乙己是即将崩溃的封建社会的一个典型的“多余人”形象,他的穷酸、迂腐的性格,完全是封建教育制度造成的。

其二,从二者的自身存在状态来说,他们的存在都充满了悲剧性。但是,奥涅金是上流社会的贵族青年,尽管他精神空虚,生活迷惘,但他在物质上却十分富有,他的悲剧性更多的是性格的悲剧;而孔乙己却是一个

6) 《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297页。

连喝酒的钱也要通过偷窃才能勉强维持的社会“多余人”，他的悲剧性除了性格的悲剧外，还有命运的悲剧，因此，孔乙己的“多余”更具有悲剧性的效果。

奥涅金是一个花花公子、年轻的浪荡子。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明显的不融于他自己所生活的整个上流社会，是因为他对这样的社会感到冷漠，然而他的这种冷漠又不是一种故作姿态的冷漠，而是时代压迫下的冷漠。他对人生太苛求，不满足于芸芸众生的那种生活，他本想使自己的一生不同一般，但却无法实现。当他在社会上处处碰壁之后，便转入到内心对美好爱情的追求和向往中。但是，当他再次向达吉雅娜表白爱情时，他却遭到了拒绝。于是，他便感到失去了生活的意义，熄灭了对个人幸福的希望，这时，无论他的行为还是处世，都表现出了悲观、消沉的“多余人”的性格特点。我们说奥涅金是“多余人”的鼻祖，主要就是因为他集“多余人”的典型与个性于一身。他的性格不仅表现在他现存的已经构成的状态，而且也表现在其发展历史中，在其确定的形成的过程中，无论是在他自己生活的各种各样的环境中(如在农村，在乡绅贵族圈中，在俄国各地周游时，在贵族上流社会的晚宴上等)，还是在他自己所处的各种不同的情节环境下(如爱情、友情、朋友之死等)，奥涅金都显得迷茫，不知所往。他厌倦了上流社会的无所事事和原地奔波，但他不知道，他自己也在进行着这样的无所事事和原地奔波。于是，他便把自己独自关在小屋里，完全抛开了上流社会，把自己孤立出来，其实这本身就是他多余的表现。他打算做点什么，但既无本领，也无愿望，“无懈的劳动他感到难捱”。因此，“这个无所事事的人，又感到自己灵魂的空虚”，他无目的，无劳动的活着，他也只能这样无目的的活着。我们可以感受得到，他的存在是多么的多余！

前面说过，相对奥涅金的多余来讲，孔乙己的多余更显悲剧的成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孔乙己的悲剧是一个善良的读书人被他自己所虔诚信奉的封建思想和衷心拥护的科举制度愚弄以至毁灭的悲剧。”⁷⁾ 这就比

7) 范伯群、曾华鹏著《鲁迅小说新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30页。

奥涅金的悲剧更有震撼力。其实,在孔乙己生活的鲁镇,在他常去的咸亨酒店,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环境中,已经人为地划分了等级的成分。在这封建社会的黑暗的一角,森严壁垒的阶级对立、等级差别、腐朽的势利眼和剥削思想、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的关系等,都异常真实地展现出来了。“多余人”孔乙己这个穷困没落的老童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他的悲剧命运便是无法避免的。读过《孔乙己》的人都知道,到这里的酒客不外乎两种人:一类是穿长衫的,“到店里隔壁的屋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着喝”的酒客,他们都是富有的“长衫主顾”;而另一类则是“靠柜外站着,热热的喝了休息”的酒客,他们大多是贫穷的“短衣帮”,“然而,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也就是说,他既要把自己定位在“长衫主顾”之列,而又迫于生活的贫困要象“短衣帮”一样站着喝酒。可见,他既不属于前者,也不属于后者。那他属于什么呢?什么也不属于!也就是说,他是多余的。孔乙己本来身材高大,又写得一手的好字,可以替别人抄书来养活自己,但他“不会营生”,又“好喝懒做”,于是只能“做些偷窃的事”。这些,都说明孔乙己的存在是多余的,对别人他是多余的,对社会他也是多余的。在人们的生活里,孔乙己的存在已经变得毫无意义,无论他存在与否,人们照常生活。“他已经失去了一个‘人’的独立价值,在人们心中他是可有可无的,他的生命的唯一价值,就是成为人们无聊生活的笑料,甚至他的不幸也是成为人们的谈资”。⁸⁾“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这是何等的悲哀,何等的具有心灵的震撼力!“这说明孔乙己的生存已经是多余的了,反映了鲁迅对这类从躯体到灵魂都僵硬了的人的生存价值是持基本否定的态度的。”⁹⁾

8) 孙伏园著《鲁迅先生二三事<孔乙己>》,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83页。

9) 黄侯兴著《鲁迅—“民族魂”的象征》,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265页。

V. 奥涅金与孔乙己形象出现的特定社会现实意义

奥涅金与孔乙己文学形象的出现各自时代、各自民族都产生了深远的意义。在这里，要探讨奥涅金与孔乙己的特定社会现实意义，多少要涉及到作家的创作思想。我们都知道，奥涅金与孔乙己已经成为了各自时代、各自民族中“多余人”的典型，普希金与鲁迅就试图通过这样的典型塑造来唤醒社会中的“多余人”，唤醒国民，拯救国家。

首先，就奥涅金这一形象而言，他就集中体现了普希金最有意义的构思：“拿出一个‘当代英雄’的形象，一个同时代人——十九世纪新人的典型的画像”。¹⁰⁾而作者的最终目的，就是通过这一形象的塑造，集中勾勒出19世纪初的俄国社会中的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的彷徨、苦闷、焦急不安的性格，从而唤醒他们。正如前面所说的，19世纪的俄国在经历了拿破仑战争之后，民族意识空前高涨。然而处于上流社会的广大知识青年，却没有积极的投身到社会即将到来的时代风暴当中，反而对这种时代风暴感到不理解、彷徨和不安，奥涅金正是广大知识青年中的典型。但奥涅金同时也是一个真正意识到自己是“人”的“新人”，他是普希金内心培养的那个时代的“新生儿”，因为只有“人”才会表现出对生活、对人生的无可奈何。他虽然是花天酒地的花花公子，但他毕竟受过时代精神的感染和进步思想的影响，他反对抵押土地，主张重农主义，并且还在农村进行过自由主义的农奴改革（尽管这样的改革他并没有坚持下去，但他毕竟实践过）；他还与自己的朋友连斯基争论过有关历史、政治和科学的问题。总之，奥涅金绝不是仅仅作为“多余人”而存在，普希金就是要通过奥涅金这一形象来警醒当时的贵族青年们。因为在当时的俄国，用赫尔岑的话来说就是：“象奥涅金这样的人在俄国每走一步都会碰见他”，赫尔岑自己也承认说：“我们只要不愿意做官或做地主，就多少有点奥涅金的成分”，因为“奥涅金的典型是这样富于

10) 智量译《叶甫盖尼·奥涅金》：普希金文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1995年版，437页。

民族性，以致于在所有一切稍能流行于俄国的小说和诗歌中都可以遇见，这并不是因为大家都想模拟这个典型，而是因为你常常可以在你的周围和你自己身上看到他”。可见，奥涅金的出现还是有他特定的社会现实意义，有他的社会价值的，因为他代表着那个社会中找不到生活出路的贵族知识分子们，代表着那个社会中的“多余人”。因此，“他们(指“多余人”，作者注)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生活着、思想着：他们豪言壮语，他们对专制的农奴制的现实的批评态度，他们的思想都是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的，同时，也是历史上所必需的事业”。¹¹⁾

而对鲁迅来说，他也是通过批判和揭示孔乙己的可笑可悲的性格来表达出他对于封建科举制度的愤懑，从咸亨酒店这一社会小窗口里来写出旧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灵魂的普遍麻木，心灵的可怕隔膜，从而唤醒沉睡的国民。然而，同为“多余人”的孔乙己却非中国奥涅金式的人物，他完全是一个被封建教育制度所愚弄和淹没的人物，是被侮辱与被损害了的灵魂，更为可悲的是，孔乙己自己的人格却没有丝毫的觉醒，属于麻木和被撕碎而毫无反抗精神和思考的悲剧人物，他的身上承载了几千年来迂腐麻木的知识分子可悲的不觉醒灵魂，具有很重要的深刻的揭露和讽刺意义。

众所周知，在20世纪的中国，平民是受压迫最深的阶层，孔乙己，这个相对于奥涅金来说更加平民化的“多余人”，就成了鲁迅所要塑造的平民知识分子的典型。孔乙己出身低微，穷愁潦倒，思想麻木，他没有腐朽糜烂的贵族生活，没有摆阔的资本，他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行动上，都十分的贴近于当时平民阶层中的知识分子，而鲁迅也总是用现实的眼光和笔触来刻画孔乙己。孔乙己的悲剧性，使我们感受到了当时国民性的麻木是何其的深。20世纪的中国社会十分的黑暗，封建统治十分的腐朽，鲁迅呼吁有更多的有志青年和知识分子站出来，扫除社会的黑暗和腐朽。然而，令人痛心的是，孔乙己等自诩的“读书人”，却表现得相当的懦弱、迂腐、麻木而又不自知，因为他们就不曾去思索过自己的悲剧的根源。鲁迅曾经感叹：

11) B·A·马努依洛夫著，郭奇格译《莱蒙托夫》，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170页。

“中国一向就缺少失败的英雄”，而“孤独的精神的战士，虽然为民众战斗，却往往反为这‘所为’而灭之”。¹²⁾ 鲁迅希望孔乙己能成为拯救社会的“英雄”，尽管他会“失败”，他会感到“孤独”。但是没有，孔乙己等知识分子宁愿做些“偷窃之类的事”，宁愿做社会的“多余人”，而却不愿站起来，勇敢的挑起拯救国家，拯救民族，也拯救自己的重担，于是，鲁迅也只能“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了。

孔乙己表达的是鲁迅对于国民麻木性的深深的悲痛，鲁迅也是通过孔乙己这一形象来表达他对这种国民性的体认，并对之进行深深的剖析，剖析这种国民性弱点形成的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因而，从这种程度上来说，孔乙己已经不仅仅只是单个的人物形象了，而成了更为广泛的、无知的、麻木的知识分子的代表，成了鲁迅表达他的对于国民性弱点的体认的媒介。因为在鲁迅看来，“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粗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孔乙己便是这样的一个体格健全，但却思想病态的人，他虽然身材高大，但也只能做一些偷窃的毫无意义的事，也只能充当酒客们的笑料。因此说孔乙己的悲剧既是性格的悲剧，也是命运的悲剧，而鲁迅正是通过他的性格悲剧和命运悲剧来揭示封建教育的极端腐朽性，控诉这个制度毒害人，戕害人的罪恶。可是，在封建社会，象孔乙己这样的深受封建科举和封建礼教戕害的人又何止他一个，但鲁迅就是希望通过孔乙己这一典型的塑造，来警醒已经受到戕害，正在受到戕害和即将可能受到戕害的人们，使他们认识到封建科举和礼教的吃人本质，并进而推翻它。鲁迅曾说过，他“看见了讲到‘孔乙己’，就想起中国一向怎样教育儿童来。”可见，鲁迅写这篇小说的主要用意，还是批判两千年来的封建教育制度，唤醒受到这种教育制度戕害的人们，尽管鲁迅的批判下还隐隐的流露出同情的成分，否则鲁迅就不会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叹了，但如果我们仔细研读一下《孔乙己》，便会深深的感受到，“从总体构思来看，作家的情感趋

12) 鲁迅著《鲁迅杂文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174、175页。

向主导方面是批判的、责备的,但熔铸其中的同情态度不仅没有削弱小说的批判力量,反而强化了作品对封建制度与传统教育的批判,动人心弦的写出了人间的凉薄”。¹³⁾在批判与同情的煎熬下,鲁迅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表达着自己的情感,希望孔乙己以及孔乙己们能完全的觉醒过来,振作起来,我想,这是《孔乙己》应该达到的效果,也是孔乙己们应该前行的方向!

其实,直至现在,当我们在研究鲁迅先生,在研究孔乙己的时候,我们都会发现,鲁迅先生的那种自我体认和善于剖析的精神不仅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是十分必然的,即使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也依然需要,特别是对广大的知识青年,尤为重要。当“我们今天在现实生活中遇到新的问题,仍能回到他(鲁迅)那里,会有意想不到的新的发现,成为新的思考与创造的一个起点”。¹⁴⁾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奥涅金与孔乙己形象出现的价值,是仅就他们作为文学形象出现所产生的社会意义而言,是从他们的文学存在意义和社会存在价值来考察的,这与前文我们所说的奥涅金与孔乙己的存在,无论对自己、对别人,还是对社会,都是多余的并不矛盾,因为那是仅就他们作为“多余人”的自体,即他们的自我存在而言的。这也应该算是奥涅金与孔乙己形象存在的双重意义。

VI. 结 语

至此,我们对“多余人”奥涅金与孔乙己已经有了一个宏观的、理性的理解和把握,但是,“多余人”形象的生命力是巨大的,不是寥寥数千字就可以言尽的,我们说奥涅金与孔乙己都是世界文学画廊中的不朽典型,是因为他们的典型性和不朽性,而他们的典型性来自于他们的独特的艺术概括

13) 冯光廉著《鲁迅小说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148页。

14) 钱理群著《鲁迅作品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1页。

性，他们的不朽性则是因为他们的深远的文学意义和永恒的艺术生命力。正如前面所说的，尽管奥涅金与孔乙己所产生的时代、地域、民族不同，但是，他们所产生的历史背景却十分的相似，他们的性格特征也十分的雷同，同为“多余人”，他们的出现在特定的时代都产生了深远的文学意义和现实意义。从文学研究的角度来说，这就是为什么到现在“多余人”还那么吸引众多研究者的原因，也是他们的典型和不朽的原因所在。然而，从社会的角度来说，“多余人”的典型性和不朽性是由他们所产生的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条件决定的，同时又是由他们在社会中所处的特定位置所决定的。正如马克思曾指出的那样，任何个人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和关系中的个人，而不是思想家们所理解的‘纯粹的’个人”，¹⁵⁾ 因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¹⁶⁾ 因此，我们在对“多余人”这一形象进行比较分析时，除了要站在文学的角度以外，还要站在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只有这样，我们对“多余人”的理解和把握才是立体的，可感的，我们所进行的研究也才有文学的理论根据、历史的理论依据和现实的研究意义。

<参考文献>

- 赫尔岑著，《文学的战斗传统》，新文艺出版社，1953。
 赫尔岑著，巴金译，《往事与随想》，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高尔基著，缪灵珠译，《俄国文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鲁迅著，《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范伯群、曾华鹏著，《鲁迅小说新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孙伏园著，《鲁迅先生二三事〈孔乙己〉》，北京出版社，2001。

15) 马克思和恩格斯著《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84页。

16) 马克思著《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18页。

- 黄侯兴著,《鲁迅-“民族魂”的象征》,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
普希金著,智量译,《普希金文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1995。
鲁迅著,《鲁迅杂文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冯光廉著,《鲁迅小说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
钱理群著,《鲁迅作品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马克思和恩格斯著,《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2004。

<Abstract>

“Supernumerary” is already recognized by Chinese and foreign literature realm as a title of literary character image, the Supernumerary Series has been developed acme in Russian literature in 19th century, the epitomizer is known as Pushkin who was called the “the Sun of Russian Poetry”. His Eugene·Onegin has become a “supernumerary” of the immortal character in world literature. The Chinese literature in 20th century also continued the “supernumerary” mold, especially Lu Xun, he created many of the classic “supernumerary” images, Kung is one of the most typical one. Although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whether Kung is a “supernumerary” remains in doubts, but if we take a closer look at the numerous studies on image of Kung in contemporary, we will find that Kung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that “supernumerary” has. On the base of rational analysis, this paper aims to compare Kung with Onegi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haracter, the history of the formation, and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etc.

Key words : Supernumerary Eugene·Onegin Kung; comparison of the characters

